

水牛刘：缔造项城第一个中共党支部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杨光林

项城市南顿镇水牛刘村是一个红色村庄。1939年6月，项城历史上最早的共产党支部——水牛刘党支部秘密诞生，这对于项城革命来说无疑是霹雳惊雷第一声。从此，水牛刘党支部开始为党组织筹集粮饷、传递情报、救治伤员、转移干部，留下了地下斗争的红色故事，奏响了动人心魄的革命乐章。



司峻，建立了项城第一个中共党支部

3月30日，在通往水牛刘村的路两边，油菜花热烈开放满眼金黄，花香沁人心脾，蜜蜂忙碌其间。除了生态美景，不时会看到路边墙上刷有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“感党恩，听党话，跟党走”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等红色标语，一路景色宜人，一派红色氛围。

当日，周口报业传媒集团《红色记忆》采访组随项城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到水牛刘村采访。采访组参观红色党支部纪念馆，采访革命后人，体悟革命前辈追求真理的执着……

项城最早党员 点亮信仰之光

轻轻推开红色党支部纪念馆大门，凝望着里面各个时期的文史资料、革命文物，真切感受到了革命者初心不变的宝贵品质。

回望历史方知来路艰辛，情感的闸门一旦打开，就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年近八旬的老党员刘永富为我们讲述水牛刘村当年的斗争岁月。提及辛酸处，他老泪纵横。

水牛刘党支部成立初期重要成员刘振东、刘振同、刘振海（韩波）三人是亲兄弟，被后人称为水牛刘村“革命三兄弟”。刘永富是刘振同的小儿子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事端，中国开始了同仇敌忾的全面抗战。国民党腐败无能，华北战场不断溃败，中原腹地河南成为抗战最前线。1938年6月至9月，日寇铁蹄先后踏入鹿邑、太康、淮阳，项城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

战争形势严峻，中共豫东特委为培养抗日骨干，通过统战关系在周口办起了“抗战建国训练班”，各县均派进步青年参加。怀着满腔报国壮志，项城南顿青年司峻（司清敏）参加了训练班。

司峻，1915年生，项城南顿司老街人。他1岁丧父，由母亲抚养成人，1932年进入省立三中（校址淮阳）学习。司峻参加“抗战建国训练班”期间，经地下党员贾达夫（贾兼善）、张先舟介绍加入共产党。司峻是项城爱国青年的杰出代表，也是项城党史上有籍可查最早的共产党员。

信仰之光一旦被点燃，就不会因敌人干扰而熄灭。训练班后因涉嫌“赤化”被国民党电令解散，司峻受党组织委派到中共沈丘县委负责纸店一带党的工作。因为抗战时期项城没有建立县委组织，而是在沈丘县委领导下活动，所以司峻领导成立的纸店党支部，分管范围包括项城南顿一带。

水牛刘党支部成立的过程，刘永富很熟悉，他说：“1939年初，司峻发展俺叔刘振海入党，之后又发展滕崇文、刘芳洲入党。6月，因形势变化，沈丘县委调司峻回家乡南顿开展工作。南顿地处国民党力量薄弱地带，司峻对这里很熟悉，有利于开展活动。回到家乡后，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，发展党员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……”

南顿党支部其实就是水牛刘党支部。据项城党史记载，南顿党支部初设于南顿光武庙、南顿初级小学，后设在位于南顿的项城第三小学，不久转移到了水牛刘村。南顿党支部改称水牛刘党支部，是项城党史上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共党支部。党支部成立之初，司峻任党支部书记，刘振海任组织委员，滕崇文任宣传委员。

司峻，是在项城大地点燃革命火种的人，革命的烈火自此越燃越旺。水牛刘党支部在司峻以及之后几任党支部书记刘振海、刘芳洲的带领下，开始了艰苦的地下斗争历程。

水牛刘党支部成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因为自党支部诞生之日起，项城大地有了共产党坚强的组织领导，开始了改天换地的新征程。

纪念馆里保存有司峻的党费证、任命书、往来书信、回忆录等各种遗物，生动再现了他革命的一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司峻曾任河南省科协副主席，1983年离休后，他充分发挥老干部、老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，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01年7月，他和几位离退休老同志撰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《多难兴邦》，文章充满爱国主义激情。司峻用亲身经历证明，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才能国家强盛、民族振兴的深刻道理。省委领导同志阅后批语：“老同志热爱祖国，关心国事，令人敬重。所写材料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，特别强调多难兴邦，值得深思。”

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为党的事业奋斗近70个春秋，2006年8月，司峻走完了光辉的人生。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是他奋斗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。

地下红色堡垒 掩护革命斗争

1939年，抗战进入关键时期，国民党却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。之后，敌人又制造了“竹沟惨案”“皖南事变”等，破坏抗战。项城邻近县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，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惨遭毒手。当时项城党组织稳定，党支部成员很团结，特别是水牛刘村比较安全。为避免被敌人“吃掉”，受上级党组织指示，项城周边一些党的领导骨干先后转移到项城隐蔽起来坚持斗争。

就在这种背景下，当时的西华县委书记李彬来到水牛刘村。

西华，是中共豫东特委、西华县委所在地，也是国民党重点打击的地方。国民党发起反共高潮后，豫东特委和西华县委形势危急。1940年，经上级党组织批准，西华县委书记李彬和妻子赵华转移到水牛刘村，住在刘振海家。

李彬在水牛刘村除领导西华党组织外，还被委派为豫皖边区党的特派员，负责周边县市地下党的活动。因此，水牛刘党支部是上级联系其他党支部的联络点，也是党的特派员活动的阵地。当时，李彬以“拉架子车，贩盐跑生意”名义作掩护，常常往返于周口和界首之间。李彬在水牛刘村工作4年多，

后调至解放区机关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，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。

在形势险恶的岁月，水牛刘党支部千方百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一个时期，水牛刘党组织成为鄂豫皖边区党委和河南省委，新四军四师、五师的情报联络站。

“在水牛刘村，李彬被安排在我叔刘振海家住了4年。俺叔被调入新四军部队后，李彬又在俺家住了一段时间。”刘永富说，“我兄弟姊妹7个，我是最小的。俺哥小时候经常帮地下党望风放哨、传递情报、收集信息，是地道的红小鬼……”

司峻回忆录中说：“我党转移到项城的同志中，有西华县委负责人李彬（西华县委书记，后为特派员）、赵华（西华县委书记）、安徽全省唯一的女乡长临泉县的韦秀芬、沈丘县委组织部长李致远、槐店区委书记丁碧岩等人。这些同志的到来，有利于项城境内党的工作，他们还继续坚持领导原来县的地下工作。”

说起水牛刘村的红色历史，刘永富自豪感溢于言表，他说：“这些转移到俺村的人中，有山东人、豫南人、豫东人，口音各不相同，掩护同志工作尤为重要。如果一个人身上出问题，就会影响整个党组织活动，甚至影响上级领导机关安全。党支部通过各种关系为转移来的同志安排了各种职业作掩护……”

有一年大雨后，刘永富家的房子受到浸泡，一面墙壁倒塌了。年幼的刘永富不理解的是，距塌墙很近处，还有一面墙支撑着房顶。长大后，母亲告诉他，那时房子里特意建有夹墙，后来成为地下党员藏身的地方。

当时的职业革命者多是外地人。李彬是山东高密人，许天民是豫西人，政治交通员是豫南人。他们在这里时间一长，使人生疑的情况多了，便引起特务的注意。

当时有特务向驻扎这一带的国民党头目汤恩伯汇报，说南顿水牛刘村有外地人频繁活动。汤恩伯立刻派人到水牛刘村入户调查，且要求不可漏过一个疑点。

国民党特务要对水牛刘村进行所谓户口调查，这对地下党组织来说威胁极大。是有人走漏了消息还是国民党特务看出了破绽？党支部成员一时紧张起来。大家分析认为，敌人不了解内部情况，虚张声势而已。在李彬和赵华指导下，水牛刘党支部作了周密部署，发动全体党员与进步群众挨家挨户宣传教育，国民党调查时就说这些外地人都是来做生意的“亲戚”，否则村里就会多出壮丁。结果国民党特务过来时，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陪同，“前呼后拥”。经过几天斗争，敌人什么也没查出来，虚惊一场。

1946年6月，国民党调集30万兵力，包围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。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中共中央决定中原突围。突围人员除指战员外，还有一批地方干部，都需要安全转移。为此，我军北上指派人到各地调查情况，确定转移路线。来项城了解情况的同志，得到水牛刘党支部的大力配合。党支部派刘芳洲、滕崇文等人兵分三路，对当地国民党的驻军、河流船舶等调查汇总，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重要而又机密的任务。后来突围时，其中有500多人路过项城，他们经过长途跋涉，急需休整、补充路费，到南顿后，分别隐藏在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家里。这批人员经过短暂休整，都顺利过境……

一次次险中取胜，考验了地下党组织，也考验了村里群众，更看到了党群鱼水情深的真挚感情。老同志在回忆中无不感慨：地下党员和群众结成互敬互爱、亲密无间的“亲戚”，关键时刻，群众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党的干部。（下转5版）